



山东弘岩寺

The Magic Cliff Monastery,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灵岩寺史迹与古塑考

张 鹤 云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物遗存丰富。山东省济南市的灵岩寺就是重要的古迹之一。这里不只存有大量的碑碣、古代建筑和墓塔，寺内千佛殿的罗汉塑像，更是我国古代彩塑艺术的珍品。

灵岩寺所在地，称“灵岩山”，是东岳泰山十二支山之一，位于泰山西北约二十公里。其山势以方山为顶点，构成一个群山环抱的绝谷（图1）；东西长约十公里，南北宽约五公里，周围峦跳崖叠，秀拔万状。谷内飞泉激越，山饶松桧，灵岩古刹即掩映于云山烟树之间。东面层崖为棋子岭、灵辟峰（又称东天门、图2）、朗公山；南面屏壁为如来顶、明孔山、黄岘山；西方谷口有鸡鸣山和塔宝峪南山头相对峙，其间豁口是灵岩山谷与外界的主要通路。鸡鸣山峰岭高耸，是灵岩十二景之一①，俗传昔有群盗，夜过其下，忽闻鸡鸣，怖而归，再往亦然，乃回心向善，人异其事，遂以名山。传说虽为玄虚，但有诫恶向善之意。其南峰西岩有麻衣洞，元代麻衣先生李坚栖隐处。自此进入狭谷，沿途美景如画，古迹林列。首先有石坊巍然屹立，额上镌弘历帝（高宗乾隆）所书“灵岩胜境”，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图3）。往东，有大横沟，石峡数折，涧崖壁立，跨沟架桥，名曰“崇兴”、“通灵”



图1 灵岩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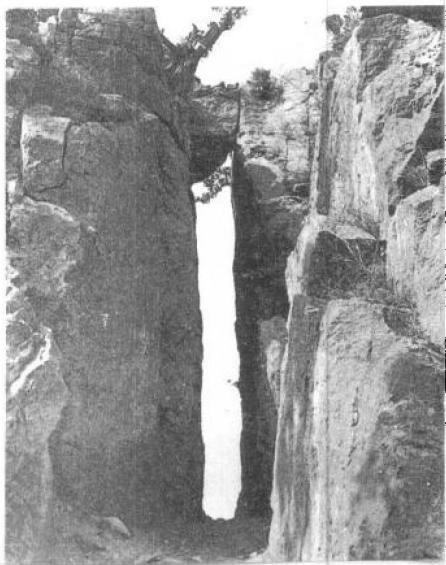


图2 东天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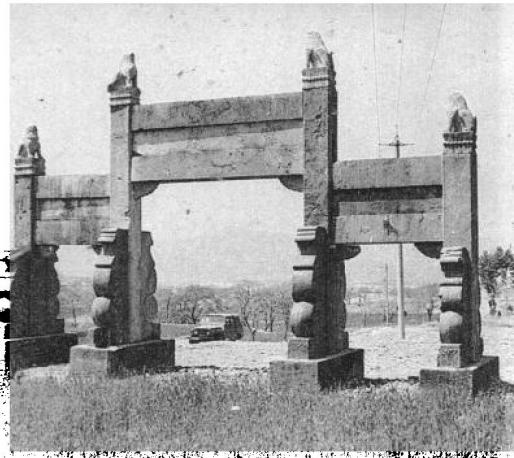


图 3 “灵岩胜境”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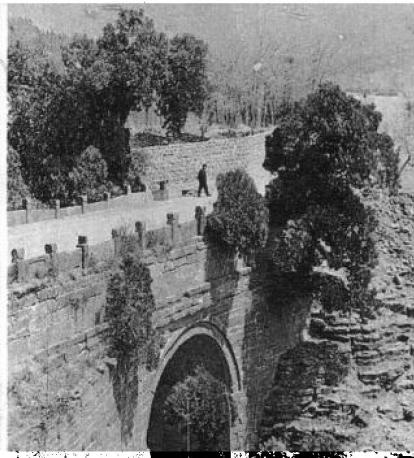


图 4 通灵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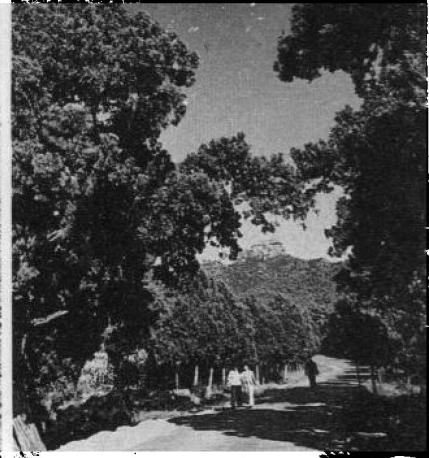


图 5 明空桥

或“崇福”，俗呼大石桥（图4）。临桥倚望，古柏横空，沟底深邃惊险，古称石桥峪。今存之桥为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本寺住持仁钦重建^②，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重修。建桥碑和修桥碑俱在。建桥碑是寺内名碑之一，碑文是北宋大山水画家郭熙之子郭思撰文，思子郭升卿书丹^③。郭思是北宋末知名的学者和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集，就是由郭思整理成书。过崇兴桥南望，石齿嶙峋，山势如楼如阁，谓之群山朝笏。峭壁间有一孔，南北相通，日色正午如明镜高悬，故称明孔山，亦灵岩之一景。沿溪谷山庄前进，又有小横沟，沟上建桥曰“明空”（图5），俗呼“小石桥”。桥头古柏枝叶连理，远望如閨门状，有对松门之称。游览者至此可作小憩，仰观群峰竞秀，俯听曲溪低吟，给人增添寻幽访胜的兴致。桥北山岗柏树森茂，呼为对松山。顺小横沟南下，东西大溪南崖，嵯峨幽僻，状如抱廈，有水自峭壁间滴沥，乱洒如雨，景境奇绝；冬季滴水成冰，远望如水晶柱，更为罕见。此地称“滴水崖”。清高宗幸灵岩，游览至此，赐名“雨花岩”，且题“雨花岩”大字额碑，并建亭，誉为灵岩八景之一^④。明空桥东为黄茅冈，路旁龟背石上建有黄茅冈亭^⑤，今称“接官亭”，意为寺僧接客处（图6）。过岗有水溪横隔，是灵岩之北溪，寺内诸泉之水合入于此，西流而下。此溪又称“饮马沟”，相传为宋真宗饮马处。沟上有明代天启年间释园桂所建的“新石桥”（图7），桥栏望柱头之石狮，雕琢生动，当为明代原物。桥头北面崖壁上嵌《十里松》大字石刻，字体秀润，乃明万历间户部主事刘亮采所书^⑥（图8）。过桥继续前进，林荫如盖，坡度愈陡，旅游者在筋疲力竭的时候，险尽地平，境界豁然开朗，有“大灵岩寺”碑映在眼前，这就是寺门前的广场。广场上原来还有“戏楼”和“方山神祠”，近年拆除。“大灵岩寺”碑原嵌于

戏楼内，今则立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迎接游客的标志。碑是元代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按察使文书讷所书。书讷乃西夏人，字国贤，号双泉（图9）。碑阴镌都转运使蒙古僧家奴跋。身临于此，翳高塞深，云烟缥缈，泉声与古木萦拂，山色与塔影交辉，真有红尘飞不到，恍若仙家胜境的感觉。

灵岩寺的庙宇建筑就座落在灵岩山主峰之下。主峰的形状，青壁四削，方正如印，古称“方山”。至于灵岩名称的来源，据《神僧传》：“朗公和尚说法泰山北岩下，听者千人，石为之点头，众以告，公曰：此山灵也，为我化解。他时涅槃当埋于此。”此乃灵岩之所由来。所谓为之点头的顽石，至今依然拱揖而立于寺东面的朗公山上，状若老僧，俗呼为“朗公石”（图10）。由于朗公在此开山说法，苻秦时（公元351—394年）曾改名昆仑山金舆谷，“盖重其人而神其地也”；所谓昆仑，即古代神话中遥远西方的仙山。以此称昆仑山，是隐喻佛教的西来和境域的神圣；金舆乃林茂粮丰之意。朗公是灵岩最早的开山祖师。在朗公之前，佛图澄也曾来此，未尝久留^⑦。关于朗公的事迹，《高僧传》记载：“竺僧朗，京兆人，……以伪秦（苻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卜泰山中”。朗公到泰山以后，倍受当时各方面统治集团的尊敬，如北魏道武帝拓跋跬、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南燕慕容德等都曾遣使致书，拓跋跬以缯素为礼，司马昌明送五色珠象，苻坚送“紫金数斤，供镀形象，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备洒扫。”至于南燕主慕容德，对朗公更为厚礼，信中称：“使者送绢百匹，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县封给”^⑧。又按《续高僧传》：“秦主苻坚，钦其德素，遣使噪遗。坚后沙汰众僧，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

图 6 接官亭



图 7 新石桥



图 8 十里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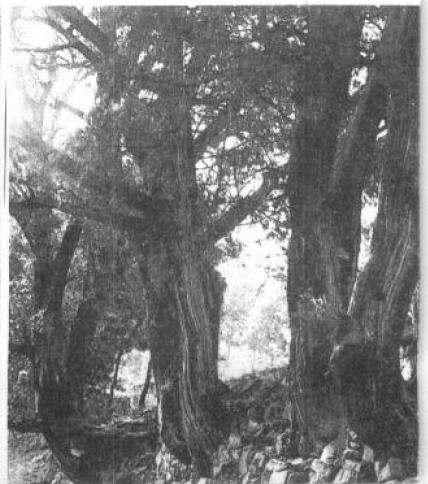




图9 大灵岩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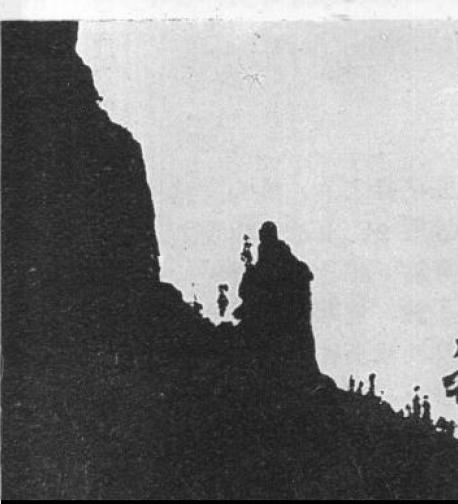


图10 朗公石



图11 石刻“四大部洲”残像

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从以上记载，僧朗能先后借重于南北朝各帝王，可以想见他在佛教界的声望。他不仅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有重大影响，即一般平民，也都“百姓咨嗟，称善无极”和“千里哲人竞奏”。这种盛况，直到“元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诏诛天下沙门，毁佛寺，革昆仑金舆之名，仍名曰方山。”

灵岩再一次开山祖师是法定。时间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公元520年），从太武帝诛沙门、毁佛寺，到法定重开山，前后荒废了七十多年。法定重来开山是“先建寺于方山之阴，曰神宝，后建寺于方山之阳，曰灵岩”。神宝寺在灵岩寺西北山岭之阴，相距约三公里。此地有神宝泉，五十年代笔者前往，遗址中存有唐代开元二十四年□子寰篆并书的《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碑为隶书，颇有书法价值。另有唐代石刻《四大部洲》造像（图11）。灵岩寺从法定重开山以后，虽又经过两次灭法，中断时间不长。法定时期的寺址在今寺东北一公里左右的甘露泉附近，到唐代可能因扩建受到地形的限制，改迁今址⑨。原寺址在清代乾隆年间建“爱山楼”行宫，成为弘历帝多次南巡的驻跸之所。

灵岩寺发展到唐代，被李吉甫誉为“域中四绝”之一。其它三绝是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江苏南京栖霞寺。吉甫在唐代元和初年累官同平章事，著有《元和郡县志》⑩。寺内现存唐代以前的文物，重要者有鲁般洞、功德顶证明殿石窟造像、辟支塔、慧崇塔、千佛殿、御书阁、李北海撰并书写的灵岩寺颂碑等。

鲁般洞，据文献记载，乃开山祖师（朗公）瘗骨处，实际考察，确是一座古代石建墓室。室南北向，西面设门，有石级可下。室内石壁上有景云二年（公元711



图12 证盟殿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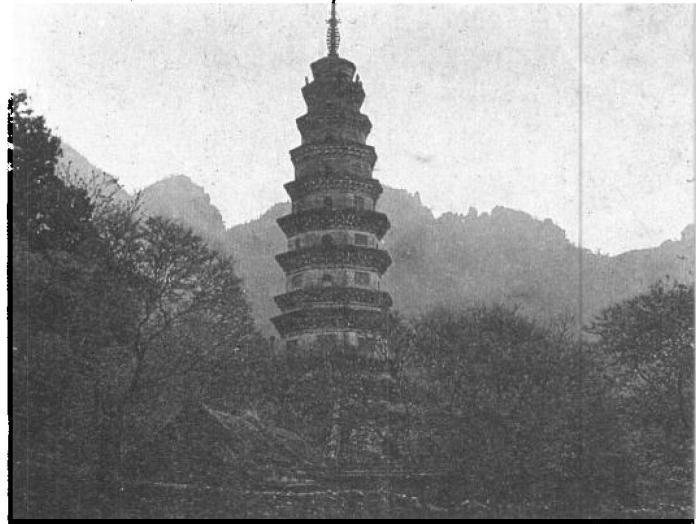


图13 辟支塔

年)、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大观丁亥(公元1107年)等游人题名刻字，说明久已为人们参观游览。唐代大书法家李邕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颂并序》碑，即嵌于洞内西壁。李邕在玄宗时曾任北海太守，故又称李北海。李氏天资豪放，文名满天下，著有《李北海集》，一生写碑很多，此碑是他六十五岁得意之作，文体骈散兼行，字体行楷并用，在邕之前用行楷写碑，尚为少见。

功德顶证明殿内石窟造像，因山石雕造弥勒佛及弟子、菩萨、侍卫、神兽等九躯。本尊弥勒高达六米，仪容庄重，颇具“兜率天宫”之态。窟壁及供桌上有多处唐、宋人题名刻字。据唐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牟珰撰《修方山证明功德记》，知该窟是为初唐所凿，从造像风格来看或许还要早些，似隋代(图12)。

辟支塔，雄伟壮观，数里之外即可遥望(图13)。基座被淤土所掩，高出地面部分，约五十四米，九级十二檐，平面呈八角形，底围四十八米，东西南北四面设门，基石刻有精致的图案，塔身以青砖砌垒。其顶有直刺云端的高耸塔刹，内有中心柱，东、南、西三面开龛，龛内原置石刻辟支佛像(图14)。此塔创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27—650年)，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重修，元、明相继修之^⑪。

慧崇塔，踞于寺西香霏岩墓塔群北坡上，唐天宝年间建，单层方形，高约五米，南面辟门，石料砌磨精致。东西饰门有侍女凭门缝半掩，极为生动。顶部叠涩出檐三层，灵巧有致。最上一层置山华蕉叶的露盘，承托宝珠形塔刹(图15)。塔壁刻有

明代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达观大师、释真可@《礼慧崇塔诗》：“龙孟盛得玉泉流，法雨慈云处处周，岩树犹含天宝色，西风落叶不胜秋。”按慧崇乃唐代贞观年间本寺住持，是把灵岩寺的建置从甘露泉迁移至今址的奠基者。寺内现存辟支塔、千佛殿、御书阁等古建筑，均为慧崇所创建。其功绩，被认为可与北魏本寺重开山祖师法定相侔。

御书阁，唐代慧崇创建，原有唐太宗、宋太宗、真宗、仁宗等御书供于内。金贞祐间，寺遭兵燹，御书尽毁，惟阁存焉。今存之阁，乃经历代重修（图16）。阁前立有明万历间重刊之仁钦篆书阁额。阁基内外嵌历代石刻多块。其中宋蔡卞于元符二年十二月和建中靖国元年冬十一月写的圆通经并楞严经，书法极佳，为世所贵。明嘉靖初，学士方豪跋语云：“灵岩名笔固多，惜多为石工所败，惟此字最佳。”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幼年从学于王安石，绍圣间登科，官至尚书左丞，徽宗时贬为少府少监。嵌此碣的石壁生有千岁檀，盘错奇古，状若游龙，与笔力奇宕的名碑上下辉映，临观者无不叹绝。

据唐书本纪，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二月高宗李治朝拜泰山，途中曾驻跸于此，次年正月前往泰山。

灵岩寺在宋代发展益盛，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名为“十方灵岩禅寺”。住持人出自敕命，此后不断有名僧到此住持传法，如行详（号道光）自京师奉命前来时，朝贤都有赠诗，当时宰相王安石《送详禅师赴灵岩》诗云：



图14 唐石刻辟支佛像



图15 慧崇塔

灵岩开辟自何年，草木神奇鸟兽仙；
一路紫苔通窟窿，千崖青霭落潺湲。
山祇啸聚荒禅室，象众低摧想法筵；
雪足莫辞重趼往，东人香火有因缘。

宋代的重要住持还有琼环（号重净）、仁钦（号净照）、妙空（号净如）等，对寺庙建树颇多。琼环住持期间，于景祐中（公元1034—1038年）筹建五花殿，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合众力重修辟支塔，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重修千佛殿。仁钦和妙空都是北宋晚期本寺住持。仁钦住持期间创建献殿、绝景亭，重修御书阁、崇兴桥、装銮功德顶证明殿内石刻佛像。妙空，据现存塔铭，知道他是在政和甲午（公元1114年）继仁钦住持灵岩，历二十八载，示寂于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春秋六十有九。他在灵岩的功绩，创建转轮藏，修钟鼓楼，另外对寺产也尽了维护的职责。塔铭云：“寺有赐田，经界广袤，岁月迁讹，颇见侵于其邻，师不与之争，而谕之以理，乃尽归所有。”他还于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筹建海会塔。

灵岩寺在宋代的情况，还见于张公亮《齐州景德灵岩寺记》和卞育《游灵岩记》。张公亮记称：“……太宗章圣尝赐御书，琅函凤篆，辉映岩谷，皇上复降御篆飞白为赐，天文炳焕，云日相照，寺之殿堂廊庑厨库僧房，间总五百四十，僧百，行童百有五十，举全数也。每岁孟春迄首夏，四向千里居民老幼匍匐而来，散财施宝，惟恐不及，岁入数千缗，斋粥之余，羨赢积多，以至计司管榷，外台督责，寺僧纷扰，应接不暇，大违清净寂寞之本教。”

灵岩寺的庙貌，主要是唐、宋时代奠定的。唐代建筑的辟支塔、千佛殿、御书阁，以及般舟殿、方丈禅堂都在北部山坡，似乎是因地制宜，至于形成有中轴线的建筑群，是在宋代。按“寺”，在汉代本是一种官署的名称，后来就成了佛教庙宇的专称。中国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从山门起在一根中轴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布置一座殿堂，两侧配廊庑楼阁等予以围绕。灵岩寺的庙貌，也是在这种传统形制的影响下，随着山坡地面的逐步平整而形成。寺内中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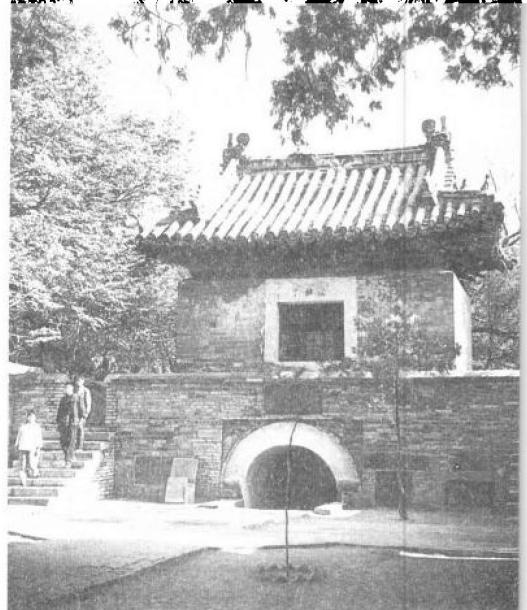


图16 郊寺图

线上的建筑，自南而北为山门、天王殿、大雄殿、和五花殿，而其建筑年代的顺序，则是自北而南。山门，又称金刚殿，约建于元代。门前有清初所置石狮一对，原还立有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山东参政通判张钦所书“千崖”、“万壑”二丰碑，惜今已不存。二山门，即天王殿，基址亦古，覆莲柱础，仍为宋代原物。殿内东壁立有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四月行详禅师奉命来住持灵岩寺的《敕牒碑》。山门与天王殿之间有水溪横隔，其上三桥并列，中曰聚善，东曰虎溪，西曰接引，皆置寺时所建，明嘉靖重修。其中虎溪乃效庐山莲社慧远的故事，送客不过此溪。天王殿北，即中轴线上的主要院落，东西有廊庑和钟鼓楼（图17），北面为大雄殿。钟鼓楼乃北宋末本寺住持妙空创建，后代不断重修，今存钟楼内的铜钟为明正德六年辛酉十一月（公元1511年）住持正昂所铸。

大雄殿，原是宋代的“献殿”（图18）。本寺住持仁钦创建于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10年），原为礼拜五花殿的前堂。五花殿内设佛像，此殿乃僧众诵经礼佛之所，本无像设，至明正德年间鲁藩捐塑三大士像于内，遂以大雄为名。清代弘历帝于乾隆二十二年来灵岩时，曾为此殿题“卓锡名蓝”额及“奇松尔日犹回向，诡石何心忽点头”楹联。奇松即指五花殿西的“摩顶松”（图19），传称唐僧陈玄奘往西域求经，临行之日尝摩其顶。诡石即指朗公石。大雄殿前原是碑石林立，古木参天，而今碑石已荡然一空，只是千余载的合生银杏树，依然健在。西侧一株的当顶大枝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雷火焚烧的灰迹，尚依稀可见。大雄殿北邻即五花殿。这是中轴线上最后的一座建筑，也是宋代筹建中轴线建筑群时

图17 钟楼



图18
大雄殿





图19 摩顶松



图20 卓锡泉



图21 墓塔林

最早的一座，为宋景祐中（公元1034—1038年）琼环长老创建。其后，明正统中僧志昂重建，清乾隆十一年僧性端重修，惜现在只存下层之墙垣。据文献记载，原是架阁两层，龟首四出，勾角玲珑精巧，有栏楯可登，上祀三大士，下祀园通菩萨，现存遗迹，四面各五间，每面中间辟门，重基垒构的形制犹在，迴廊石柱和柱础有的仍为宋代原物。

五花殿北有古柏一株。其旁《汉柏颂》碑为长清县知县王之土立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据此可知，在明代已称古树。汉柏的东北，苍苔之崖，有卓锡泉（图20），世传为佛图澄锡杖卓出者，又名锡杖泉。崖上嵌乾隆御题《卓锡泉》大字额碑及诗刻碑二首。又东有“双鹤泉”，《齐乘》称“立鹤泉”，今已塞涸。金代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陈寿恺撰《灵岩祖师观音托相圣迹》序称：“昔法定建寺，患其无水，双鹤飞鸣，其下涓涓，果得二泉”。

金元时代，灵岩寺香火依然隆盛，从寺内建置和游览者的题记、以及墓塔群中遗存的大量墓塔、塔铭，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盛况。此时期的住持人仍然出于敕命，并与国内的名寺如北京大万寿寺和河南嵩山少林寺关系密切，主持人之间相互调遣。

墓塔群在寺西香霏岩南麓，有唐、宋、金、元、明各代墓塔、塔铭二百四十余座，数量如此之多，时间如此之长，保存如此之完整者，为国内其它寺院所少见（图21）。这批文物，不只记载了许多佛教史和地方史的资料，墓塔的不同形制和雕琢精致的大量图案纹样，也是研究墓塔演变和历代图案的宝贵实物（图22）。塔群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日本山阴道徂州正法禅寺住持邵元¹³为灵岩寺第三十九代住持撰文并书写的《息庵让公禅师道行碑》（图23）。文中称：“……



图 22 墓塔雕刻力士（1282年）、狮子（1323年）



图 23 息庵让公禅师道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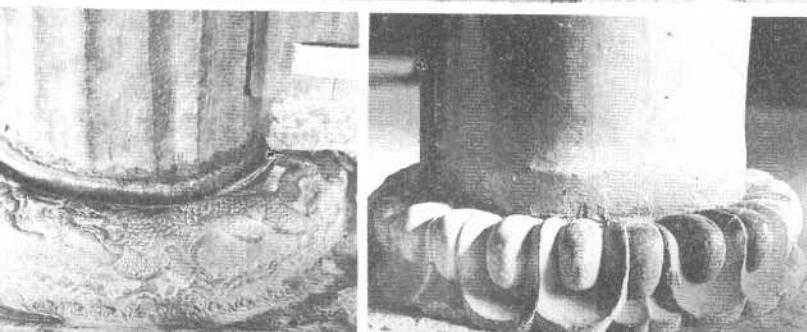


图 24 千佛殿

图 25 千佛殿柱础

小师胜安携师行实，不远千里来乞文于我，而我乃日本之产”。文中还称赞息庵：“自我万松大宗师去后，天下禅林而道风鼓舞，二严获者惟师也，于是师之生世幼而至于壮，壮而至于老，皆道丰时盛，而遂得其志，以至嫡嗣古岩大和尚，天下禅老谁能出其右乎？主于灵岩，天下名刹谁闻而不仰于其风欤”。这块碑可谓是中日两国人民古代友好关系的例证。郭沫若曾为此碑题诗：

息庵碑是邵元文，求法来唐不让仁；

愿作典型千万代，相师相学倍相亲。

明代，正统至嘉靖期间最为兴盛。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敕赐崇善禅寺”，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圣旨碑》文称：“山东济南府长清县崇善禅寺，自正统年来，相继修建，又颁赐大藏经，并敕书于内，以为祝釐之所。……特降敕护持之，升戒坛宗师至珍为僧录司右觉义，仍于寺住持，领众焚修祝赞，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按至珍，号古奇，正统中赐紫，钦依万寿戒坛传戒宗师兼崇善禅寺重开山第一代住持，任事练达，功果颇多，且能文善辞，士大夫多交往。明代建墓塔风气仍盛，遗存益多。对于寺庙建筑不断修葺，随着宗教信仰的多样化，也建造了一些新的殿堂，但规模都不大。清代，顺治己亥（公元1659年）重修般舟殿，是清初比较大的工程。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弘历帝于此建爱山楼行宫，成为南巡必经之地，为山灵增重，有助于寺庙的保护和修缮，但实际建制情况，不如前代。如元代创建的龙藏殿，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毁于火后，即无力重建。清代晚期，经济更为困窘，原有的般舟殿、五花殿、孔雀明王殿、转轮藏等都因年久失修而倾圯。从现存碑碣记载，虽不断动工，也只能勉强维持旧貌而已。

明清两代，寺庙建置虽无扩展，但泉石之美，并不因此而退色。时光的飞逝，寺内遗存的文物古迹，则由于历尽沧桑而更为生辉，所以，明清时代香客游人，不减从前。文人学者来此探幽访古者，不胜其数。山东典试王守仁、学使施润章、考古家顾炎武、桐城派文人姚鼐、篆刻家黄小松，都留有诗文或考古记录。明代尚书王世贞（字凤洲）尝谓：“灵岩是泰山背最幽绝处，游泰山而不灵岩不成游也”。

灵岩寺文物，更为有价值的是列于千佛殿的古代采塑罗汉。千佛殿是寺内保存下来最早的木构建筑（图24），位于寺的后部，座北朝南，殿前周以围墙，其左有级可登御书阁、方丈禅堂，其右有级可至辟支塔。背后崖上为般舟殿遗址。千佛殿为唐贞观中本寺住持慧崇移建，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本寺住持讲经赐紫沙门琼

环重修。其后，历代不断修葺，考诸碑记及文献，明嘉靖间重建，万历间德藩重修，梁间存有“时大明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九月初八日，德府重修”题字。清代经过五次较大的重修，即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僧净意重修，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同治甲戌年（公元1874年）、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其中同治甲戌年由布政使衔山东署布政使司按察使三韩长庚协助捐款重修工程较大，用银二千七百两，这次并给塑像妆銮敷彩。殿虽屡经重修，其形制大体如旧，仍保持宋代风貌，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建于高约两米的基座上。基座前沿铺面石上存有槽孔痕迹，证明原有栏柱装置。殿平面由檐柱及内柱各一周合成，分内外两槽，外槽檐柱与内柱深一间，若是一圈迴廊，内槽深两间、广五间的面积内别无立柱。内槽大梁四椽明袱是前后内柱间的联络材，檐柱皆为石料，刻十余条凹棱，明显受外来影响。柱础呈覆盆形，雕莲瓣及龙凤，精美古朴，为唐、宋原物（图25）。顶为庑殿式，单檐，斗拱疏朗雄壮，出檐深远，檐角长伸高耸，显示出展翅欲飞的气派。殿中央台座供大像三尊，中为毘卢遮那佛，藤胎髹漆，端坐于很高的莲花座上，莲瓣细长灵巧，各各分离疏散，别具风格（图26）。东侧为药师佛，西侧为释迦牟尼，皆范铜为之。三尊大像庄严肃穆，眉宇间凝视的目光，与观者视线呼应，充分表达了佛与朝拜者“人天相接，两得相见”的目的。壁面有千佛装饰，用分身释迦集会说法以显示莲花藏世界教主毘卢遮那佛的热闹场面。千佛多数为木雕，少数为铜铸，约明代所置。周围壁坛即为古塑罗汉，共四十尊。坛座高约七八公分，脚座高约三十三公分，脚座至罗汉头顶高约一百五十五公分（图27）。整体



图26
千佛殿中央佛像



图27
罗汉群像

看大小一致。比真人稍大。

这批罗汉像，是用传统的采塑方法塑造的。传统采塑，是大形与细部塑绘结合的办法，如袈裟只塑出大体起伏褶纹，而衣领、袖口花边，则有的略加立粉线，有的只是彩绘。眉、须、发际多以色墨描画。传统的塑造过程，先根据拟塑人物的动态用木制成骨架，手指等细部则以铁条为之。骨架作好后，首先缚扎芦苇或谷草构成体积的雏形，然后护以粗泥，捏塑胚胎，干后，再用湿润粘软的细泥自内而外逐步添泥，用捏、塑、贴、压、削等办法塑出具体的形象。此所谓中泥，中泥干后，再用榆皮绒（或麻筋）、细沙、胶泥合成的泥膏塑造形体表面的细致部分，干后经过修整，涂以胶质混合了垩白的地色，最后用点、染、刷、涂、描等技法敷彩，画出细部。在手、足、颜面和肌肤露出的部分，有时还要涂以油脂或蛋清润饰皮肤，使之呈现柔软、光泽和韧性感觉，从而达到“神采具足”栩栩如生的效果。传统塑像，经过如此合理的配料和有步骤的制作，能够经受温度、湿度的变化而不致于龟裂或起甲，可以长久保存。

这批塑像在技艺方面，造型写实，神态感人，可以窥见古代塑造家们的精湛技巧和创作才能，是学习古代塑造的优良传统和民族形式的宝贵借鉴。概括其艺术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人物性格刻划入微：虽然这些塑像都是罗汉，生活范围不广，并且均为坐式，但参观时不感到单调，其原因就在刻划人物性格上，口有情、目传神，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如西东两侧为首的两尊，虽然都是禅定姿态，而精神世界却迥然不同。西侧者壮年有为，东侧者则一意禅观。如果探究他们的身世，前者是东晋道安门下的庐山莲社慧远，后者是承师遗命泛海来中国的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子达摩，他到中国后净行修炼，面壁九年，两尊像均符合其不同的身世。又如三十六和三十七两尊，虽然都蕴藏着内心的沉痛，但神情各异。三十六尊神态寒怆潦倒，似乎是有说不出的内心隐恨，而三十七尊则皱眉抽涕，似乎在悔恨自己的过失而内疚。所有这些塑像，或忍辱苦修，或探究真谛，明显地表露出塑造者十分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划，所以我们一见就感到神灵活现，引起对他们身世的联想，使我们似乎看到他们过去的经历，理解他们在修炼中的艰苦生活。

二、风格写实：这是塑像给予观者的另一个突出印象。中国古代匠师在塑像时只是凭记忆和想象，但这些塑像的写实程度，象有模特儿为依据，其形体、比例、相貌不但符合一般人体生态，并具有山东人强壮魁梧的特征。虽然知道这些都是泥

塑偶像，但参观时俨然进入了僧侣们谈经论道的殿堂，一片热烈气氛，真切感人。罗汉的姿态，有柱杖，有端拱，有屈一膝者，有脱两履者；神情有的据理争辩，有的义愤填膺；耄耋者低眉，猛勇者怒目，或纵目远眺，或凝神沉思，可谓千姿百态，无一雷同。艺术风格的写实，并不意味着没有夸张和取舍，其关键是作者能够“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三、衣饰贴体利落和富于节奏感：整体塑像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是与衣饰的造型韵律分不开的。作者处理衣纹，对线条的直曲、体积的起伏、角度的转折，斜度的动势，光暗的变化都非常注意节奏感，刚柔相济、虚实对比。衣纹的深、浅、浮、实是根据内在体积运动而成形，透过衣纹能体察人体肌骨的形状，因而有的刚健有力，有的柔美流畅；或清姿秀骨、或丰满雍荣。衣纹的繁简变化，也有意衬托面部表情和手势，特别是胸前宽而平的外衣领和卷曲的白色内衣领，对突出头部具有重要的作用，使观者不由地会把目光注意到头部。另外衣带的来龙去脉和结扣的穿插也都交待分明，维妙维肖。由于衣饰摹仿丝绸袈裟的逼真，象是在迎风微动，使观者更增加了栩栩如生的真实感。

四、与大殿配置得当，构成宣扬佛教不可少的因素：做为敬佛礼拜的殿堂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塑像，人烟气氛浓厚，善男信女们前来拜佛，在进寺经过山门和天王殿时，声色俱厉的天王力士，给朝拜者很大的精神威慑，进入大殿，佛的面相虽然慈祥，但还是有隔膜，而拜佛之后，看到这些佛的弟子（罗汉），有如市井中普通的人，这就无形中消除了这种隔膜，使朝拜者感到佛是可以接近的，能够为自己解除苦难。从这一点来看，说明古代艺术家为宣传佛教创造出的罗汉形象是非常成功的。古代宙宇，每年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来朝拜，除宗教的信仰外，与这些艺术形象的魅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四十尊塑像，一般统称罗汉，但据现存木牌题榜，本寺开山祖师朗公、重开山祖师法定，以及庐山莲社慧远、天台智者、太湖慧可等名僧皆在其中。据题榜，中国高僧十一尊，梵僧罗汉二十九尊，至于原来哪些是罗汉，哪些是高僧，或哪一尊是可靠的名字，已难分辨。有的题榜与仪容错误明显。题榜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寺僧大文所置。笔者曾访问过他。据称在挂这次题榜之前，原有木制座牌分置像前，因年久不全，故重写题榜时，遗失者是随意从佛经上查了些梵僧的名字予以添补的。这说明现在题榜并不可靠。在罗汉造像中，一般均作世俗僧侣的样子，其仪容与名字，在历史上久已囫囵不清，而罗汉四十尊之数，向无前例。笔者推测，有

可能把高僧与罗汉混塑在一起。当然，后代在重修中也可能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变动。

关于这四十尊塑像的确切年代尚难肯定，因为佛教从唐代禅宗教派盛行，反映在罗汉像上着重精神状态的表现和密切结合生活。在佛教艺术走向现实的影响下，宋代的雕塑家也越来越注重写实手法，宋代遗留下来的雕塑，有不少是直接观察生活具有高度的写实技巧的作品。宋代以后的一些罗汉造像，由于雕塑家们直接依据生活或承袭前代粉本，其时代特征已不很明显。特别是明代有些作品直接模仿宋代，写实技巧亦高，也是造成难以辨别其时代的原因。在确切年代尚无可靠的文字材料之前，依据风格，暂定为宋代。笔者意见，原作可能与千佛殿重建为同时，即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因为修殿就不能无像设。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经过较大的重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又曾重修并给塑像敷彩。从同治至今已逾百年，衣饰色彩犹新，因而推想三、五百年重修和装銮一次，可资凭信。一般庙宇内的塑像如果不受灾毁倒的毁坏，保存这样长时间的也不少。再者，与同时代其它寺院塑像风格相近，如苏州甪直镇保圣寺塑像（图28）和太原市晋祠圣母殿塑像（图29）。按保圣寺塑像为宋代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的作品。晋祠圣母殿塑像为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的作品。灵岩寺塑像如定为与嘉祐六年重建殿同时，则与此两处塑像年代相距不远，故风格上有共同之处。另外与国内其它各处有北宋年号的雕塑互相印证，也都有共同之处。宋代的佛像虽渐趋程式化，但泥塑罗汉在写实的技法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罗汉尚未成为佛，有较多的人性，故在塑像上是以现实人物为标准；又由于泥塑比较容易掌握，所以对性格和心理状态的表现上有超越的成就。它的基本特征是能够大胆尝试，反映出在生活中所曾感觉到的神情，虽然罗汉像一开始出现即是以真实人物的自然姿态为标准，但这种写实的高峰，可以说是宋代。其特征是姿态多变化，现实感强，衣饰卷褶自然，面形较方，外眼角向上吊，结构上筋骨逼真，有的脉管亦隐约可见，手足都比较瘦削。而明清塑像虽有一部分是追求写实，但缺乏内心的含蓄，给观者的感觉是刻意求精，姿态呆板，衣纹层次厚拙，手脚臃肿、腹部也肥胖凸出，颈部粗钝，面部并多假眉假须的装饰。

如上所述，这批塑像定为宋代，主要是依据塑像风格。今遍查灵岩寺的碑碣和文献记载，均无可考，但过去也向有宋塑之称，考其文字依据，主要是来自日本人大村西崖氏所著《中国美术史》^⑭。该书称：“宣和六年成山东长清灵岩寺之五百罗汉像，前年南京内学院告予云：‘今只存四十尊矣’”。因此，国内很多学者都附和为



图29 太原晋祠圣母殿塑像

图28 保圣寺塑像

宣和六年。首先，傅抱石著《中国美术史年表》宣和六年条内录称：“山东长清灵岩寺五百罗汉成，今只存四十……‘灵岩五百罗汉记’”。其次，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编《中国美术史讲义》：“罗汉原数为八百，传为宋宣和六年造”。李浴编《中国美术史纲》：“当我们看到山东长清灵岩寺的宋宣和六年之罗汉时……”，以上诸说之依据，均是来自大村西崖的说法。再考大村西崖说法的来源，是出自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齐古《施五百罗汉记》。他误认为这四十尊塑像是该造像记中所说五百罗汉的遗存。考《施五百罗汉记》，乃宋徽宗宣和六年中秋日奉议郎赐绯鱼带宋齐古谨撰，住持妙空大师上石。文内齐古自称：“政和之初（公元1111年），得官闽中，俗工造像，尤为精致，随月所入，食用外悉付工人，成五百罗汉，历水陆五千里至于灵岩，自少游学及窃禄仕，踪迹萍梗，几半天下，投老倦游，将欲屏迹闾里为终身之计，日奉香火，同登觉路，此夙愿也。”又云：“内辨其质，莫非木雕，外睹其饰，尽是明金”。据此可知，齐古所施者，皆为小型木雕贴金罗汉，故可载舟车历五千里运抵灵岩，与现存千佛殿内泥塑施彩之罗汉迥异。该碑立于十王殿前，殿早毁于火，今存者为清咸丰元年重建，亦圯废。此地可能是宋齐古施五百罗汉堂之旧基，寺僧与游人不审碑文，以宋齐古所施木雕贴金罗汉代千佛殿内泥塑装彩罗汉，致有此误。多年来美术史著者未详读碑文，因而讹误延依不绝，于此有提出之必要^⑯。传称宋塑的另一